



【文化观】

看懂“女主角”，才算看懂这些名画

□袁凤

女性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她们是美的化身，也是历史的见证。日前，摄影家、导演马良在中华艺术宫讲述了“中国图像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其独特且细腻的视角。

《女史箴图》： 南北朝就有“女汉子”

《女史箴图》是东晋顾恺之的传世名作。它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存世的第一张有作者署名的专业画家的作品，也是中国第一张画在绢帛上的作品。在审美上，《女史箴图》贵在“神韵”二字。魏晋之前的人物画大都不太注重描绘人物的容貌，而顾恺之则用极其细腻的线条描绘了宫廷女性的神韵，他用笔非常轻盈优美，因此后人用“高古游丝描”来形容这幅名作。

那么作者用心描画的女主角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呢？《女史箴图》其实算是一幅插图性画卷，是顾恺之依据西晋张华所写的《女史箴》一文而画。西晋时期贾皇后夺政擅权，外戚扰乱朝政，张华因博学能文而被贾后赏识，但张华不满贾后专权，就写了一篇《女史箴》来讽刺她，意在劝说后宫女性要修德养性。这篇文章一共340字，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苦口陈篇、庄言警世”的名作。

《女史箴》原文一共有十二节，顾恺之也相应地画了十二段，现在存世的有“冯媛挡熊”至“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共9段。在马良看来，画中的第一个故事就带着些许魔幻色彩。汉元帝率后官众人观看斗兽表演，突然一头黑熊跃出围栏，直逼汉元帝，此时冯婕妤挺身而出，保护汉元帝。画卷中的冯婕妤虽身材纤弱，但面对黑熊的突袭毫无惧色，顾恺之将冯婕妤

临危不惧的神色表现得十分突出。此画的第二段描绘的是班婕妤拒绝与汉成帝同辇，以防成帝贪恋女色而误朝政的故事。除了描绘这些带有道德教化性质的历史典故外，《女史箴图》也有一些反映当时女性形象和生活状态的普通场景。

马良认为，图中女性的头饰和服装也是一大看点，其中有一种花形的发簪，是中国古代女性代表性的首饰，叫华胜。华在古代通“花”，华胜也就是把鲜花盛开的样子戴在头上的意思。画中的女性服装有一大特点，就是裤腰特别高，几乎从胸部开始就有两条很长的飘带垂下，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虢国夫人游春图》： 中性风引发主角之谜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描绘了唐太宗年间，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及其眷属，一行八骑九人挥鞭策马，外出踏青游春的情景。画的主题是“游春”，但整个画面既没有青草绿木、归燕鲜花，也没有春水微波，就在人物的神情与骏马轻举缓行的英姿中，令观者感受到了风和日丽的春天气息。

画家在这幅波澜不惊的画中藏着一个大大的谜题：究竟哪一位才是女主角虢国夫人？初看此画，似乎好几位女性都像女主角。画中有一人骑着马在开路，后面有一个女孩跟着他，女孩梳的发型是丫鬟头，肯定不是虢国夫人。后面还有一位白衣骑士，骑士背后还有两位女性，这两位女性都化了浓妆，有人认为虢国夫人应该就在这两人之中。她们后面有几个女孩带着孩子，应该是奶奶，此外还有几个女孩也梳着丫鬟头。

那么这两位浓妆女性究

竟谁才是虢国夫人？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梳着一种特殊的发髻，这种发髻叫作坠马髻，这种发髻是唐朝的贵妇所梳。然而，单凭发髻还是说明不了问题。有学者认为，真正的虢国夫人其实是第一位身着男装的开路者。如果仔细看过这幅画的原作，就会发现这位开路者其实长着一张女性的脸，她有着漂亮的弯弯细眉与红唇。这与后面其他男性的脸的画法不同，却与其他女性的脸用的是同一种笔法。谁也没想到虢国夫人竟穿了一身男装，混淆了性别角色，引发后人的许多探究与讨论。

唐朝有一首诗曾经提到过虢国夫人：“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官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诗中写得很明白，虢国夫人是素颜爱好者，她从来不化妆。除了诗歌，历史上还有记载证明，虢国夫人一直对自己的容貌很自信，并不喜欢化妆。这也证明了她身后那两位浓妆的女性并不是虢国夫人。马良认为，《虢国夫人游春图》可谓生动记录了唐朝当年的穿衣时尚——女穿男装的中性风。因为除了虢国夫人之外，细看之下还有两位女仆其实也穿着男装。这种以穿男装为乐的风俗，可见唐朝的女性是何等自信洒脱。

《捣练图》： 纺织女工也很时尚

张萱不仅擅画宫廷贵族女性，也擅长画普通劳动女性。《捣练图》就是其绘制于绢上的名画。按照劳动的工序，画中的女孩被分成捣练、织线、熨烫三组场面。那么捣练这道工序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古代的制绢工艺分生绢和熟绢。刚做出来的丝织品比较硬，穿在身上不舒服，捣练的过程就是把刚做出来的丝织品放在专门的杵臼里捣软，通过击打让织物变得柔软。在负责熨烫的女孩手里可以看到最早的熨斗，这种熨斗一直到清朝时还在使用，这种熨斗是一个带长把的铁勺，勺的底部是平的，勺子里面放些火炭，从而烫平丝织品。这幅作品是以纺织工艺为题材的，画中所有女性穿的衣服花色都很丰富，这也是中国古代绘画中将女性服饰的面料细节描述得最丰富的作品之一，充分说明了唐朝的织染水平已经很高。

除了生动的劳动场面，马良在欣赏这幅画时还尤其注意女孩的发饰，也就是她们头上戴的花钿。这种金属的小片带上一根针就可以插在头发上，金属部分也可以单独贴在额头上。《木兰辞》中的名句“对镜贴花黄”，指的就是女孩贴在额头上的这种装饰。最早的花黄是用花瓣做的，后来也有人把蝴蝶或蜻蜓的翅膀直接剪一小片贴在额头，甚至还有女孩把鱼的骨头贴在额头。

□郑学富

我国古代尽管没有法定的植树节，但是自古就有春天植树的好习惯和一些护树的法令法规，一直到近现代诞生了植树节。

上古时期已有五谷种植活动，黄帝的妻子嫫祖教民养蚕，那时应有桑树种植。《周书·大聚篇》说：“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这可能就是最早的保护山林的法令。舜还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处理全国的林业事务。在周代，洛阳的车马大道两侧都要植树，并且设置庐舍，存放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诗经·召南》有一首《甘棠》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因为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判决案，公平公正，人们要保护好这棵树，以怀念召公的功绩。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皇帝多次下诏鼓励植树。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礼记·月令》说：“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当时的官员就知道要防止乱砍滥伐，保护林木。汉朝在漠北一带种植大量榆树，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改善边关驻军的环境，防止匈奴的袭扰。

据《开河记》记载，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后，采纳大臣建议，诏令百姓在运河两岸广植柳树，以固河基，并制定奖励措施，每栽植一棵柳，奖励绢布一匹。没过几年，大运河两岸已经是杨柳依依，郁郁葱葱，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唐人杜宝撰写的《大业杂记》说：“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

唐朝是一个森林密布，木材和林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朝代。朝廷重视“劝课农桑”，《田令》规定“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通过法律规定在田间种植不同的树种，改善农田周围的环境，防止农田的水土流失。《唐律》有不少条款涉及林业。《唐律疏议·杂律》就规定：“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林木稼者，准盗论，即亡失及误毁官物者，各减三等；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这些都是以森林保护为重点内容的国家法律。

宋太祖为了巩固黄河河堤，于建隆三年（962年）九月下诏：要求汴京与周边地区的官吏和民众在黄河、汴河两岸堤坝上种植柳树、榆树。各地官民都在黄、汴堤坝上植树造林，使得黄、汴堤岸及其周围地区形成小型生态系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宋朝还规定垦荒植树者可以不缴田租，植树成绩好的官吏还可以晋升一级。宋代法律规定禁止民众砍伐桑树、枣树作为柴薪，“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毁坏木林者最低面临三年刑罚，最严重者甚至要被处死。

元世祖忽必烈专门颁布了《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

桑、枣20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当时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谁敢“非理砍伐”，一概按律治罪。

明太祖朱元璋以农桑为国之本业，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植树任务者惩罚，对砍伐树木者治罪。

清朝时，朝廷要求地方官员劝导百姓植树，并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据有关史料记载，乾隆帝曾规定永定河护河的士兵每人每年要种柳100棵，并且对树苗的规格、栽植标准有严格要求，要保证成活率。为鼓励永定河沿岸村庄的民众广泛植树，清政府还制定了若干奖励办法，每户植树五十株以上者，予以奖励；百株以上者，另外加奖；千株以上者，予以重奖。乾隆皇帝还总结出植柳的经验，写成一首五言诗：“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碑文至今仍立在永定河金门闸东侧。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一个法定意义上的植树节，直到民国时期才设立植树节。我国第一个植树节的设立是中国近代著名林学家、教育家凌道扬先生倡议的。凌道扬，广东省宝安县（今深圳）人，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奠基人和中国林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凌道扬曾自述从美国学成回国时的情形：“已有之林木，旦旦而伐之，荒芜之山麓，一任若彼濯濯耳，故所谓森林，遂未之见，所谓造林，尤未之闻。时至今日，直接则实业之母材缺乏，间接则地方之保安寡赖，膏腴大陆，沦为贫瘠之邦，有心人何忍漠然置之？”1914年，凌道扬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森林法》，于同年11月颁布实施。1915年，凌道扬和韩安、裴义理等林学家看到祖国遍地荒山秃岭，濯濯不毛，联名上书北洋政府农商部长周自齐，倡议以每年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北洋政府于1915年7月正式下令，规定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并于次年在全国推行。此后，凌道扬于1917年发起创建中国第一个林业科学组织——中华森林会（后易名“中华林学会”）。1921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林业科学刊物《森林》创刊（后易名《林学》），凌道扬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温差较大，清明节作为植树节仅对北方地区适合，对南方来说已经太晚，已经过了植树的最佳时机。如当时的湖南省都督谭延闿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定在每年的春分为植树节。1928年，在孙中山逝世三周年之际，孙中山的逝世日3月12日被定为植树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植树绿化工作。1979年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每年3月12日为我国植树节的决定”。

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